

永远的《唐诗三百首》

王蒙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本文以清代前期诞生的唐诗选本《唐诗三百首》为主要研究对象, 首先介绍该书作者及其《唐诗三百首》成书, 继而分析其编选特色, 接下来重点分析其书在清的传播, 探讨清人对唐诗的接受史观, 同时介绍其在清以来的版本情况。综上, 以期对《唐诗三百首》的经典化历程做一个梳理。

关键词: 《唐诗三百首》; 编选特色; 传播; 经典化

中图分类号: I22

文献标识码: A

一、孙洙与《唐诗三百首》

经朱自清及后人的多方考证, 确认《唐诗三百首》的编者是孙洙无疑。关于孙洙的记载, 主要见于《梁溪诗钞》、《名儒言行录》、《新安孙氏家乘》(含迁无锡一支)和其所做知县的地方县志。现对《名儒言行录》中对孙洙的简介摘录如下:

“孙洙, 字临西, 号蘅塘, 晚号退士, 无锡人。性颖敏, 家贫, 隆冬读书, 恒以一木握掌中, 谓木生火可御寒。清乾隆九年以庠生中顺天举人, 考授景山官学教习, 除上元县教谕。十六年, 成进士, 历知直隶卢龙、大城县事。所至必谘访民间疾苦, 平时与民谆谆讲叙如家人父子, 或遇事须答责者, 辄先自流涕, 故民多感泣悔过。宰大城时, 捐廉浚河道, 民食其利。公余之暇, 诵读不辍, 恂恂如书生。后罢误, 起复知山东邹平县事。庚辰壬午, 两校省闱, 所得皆知名士, 改江宁府教授。三握邑篆, 囊橐萧然, 淡若寒素。每去任, 民皆攀辕泣送。归举乡大宾, 至老不废。学诗宗少陵, 列入《梁溪诗抄》。著有《蘅塘漫稿》, 辑《唐诗三百首》, 通行海内。康熙辛卯年, 乾隆戊戌卒。”^[1]

从这则记载中可见, 孙洙, 是江苏无锡人, 幼时家境贫困, 聪敏好学, 中过举人和进士, 当过官学教习、一县教谕、相继担任过大城、直隶卢龙、山东邹平三县的知县、山东乡试考官、江宁府学教授。在任上, 他为人谦和, “与民谆谆讲叙如家人父子”, 恪尽职守, 治政有方, 关心民间疾苦, 待民如家人, 能教化百姓, 受民拥戴, “每去任, 民皆攀辕泣送。”在大城为官时, 捐出廉俸, 兴修水利, 惠利于民, 是一个治政有方、爱民如子的地方官员。在他担任山东乡试考官时, “所得皆知名士”。可见, 孙洙在选拔人才上也是独具慧眼。而闲暇之时, 孙洙则勤于读书, “恂恂如书生”, 廿八年因公左迁调补江宁府教授, 尝曰: “‘读书最乐, 此获我素心矣!’欢然而去。”看来, 相比做官, 他更乐于读书, 也自有一片小天地, 好诗善文, 诗宗杜甫, 著有《蘅塘漫稿》。同时, 两校省闱, 作为考官, 他有着丰富的阅卷经验, 知晓熟悉阅卷的标准, 了解阅卷人的心理, 而他博学能文, 是有能力指导学生学习诗歌时文的。纵观孙洙一生, 贫寒的家境和三任县宰的经历, 接触最多的是黎民百姓, 他始终和下层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亲身经历与感受, 使孙洙将目光更多的投向了平民。因此这些都影响了《唐诗三百首》的编选。

孙洙在编选《唐诗三百首》时, 对其编选原因、目的以及书名缘由有所斟酌, 他在卷头题辞中说:

“世俗儿童就学, 即授《千家诗》, 取其易于成诵, 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 工

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

[2]

题辞虽简短，内容周详：首先，编选原因。在《唐诗三百首》之前，社会上流行《千家诗》，因为其“易于成诵”，这是孙洙编选新的选本时一定要借鉴的成功经验。但是，《千家诗》选诗标准随意，体例不一，作者时代不一，促使他决心编选一部新的唐诗选本取而代之。其次，编选目的。用他的话说，这本书的阅读对象当是家塾中的书童，“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专供他们启蒙之用，而且要达到“白首亦莫能废”，也就是说，他必须要选出脍炙人口的唐诗精品，不仅供儿童启蒙之用，老年人也可诵读，以收长幼咸宜、雅俗共赏的效果。第三，书名缘由。取名“唐诗三百首”，该是从谚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中化出，书名缘由里面也体现了孙洙编选诗本实用性的特点。

二、《唐诗三百首》的编选特色

《唐诗三百首》的经典化与其本身的内在价值密不可分。童庆炳认为“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3]，正是这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构成了文学经典的阐释空间。也就是说不少被构建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都以文字的形式写出人类最真切的情感，传递民族文化所共有的精神，使读者在阅读时结合自身阅历时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孙洙编选《唐诗三百首》只为做一家塾普及读本，这样的定位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主情意识

自汉魏以来，个性化思想的兴起，使文人们自觉探索文学的独立性，在诗歌领域，“诗缘情”的诗学主张被提出，诗歌的产生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情感是诗歌的本质，也是诗歌能打动人的内在力量，《唐诗三百首》中也是这样的观念，用真挚的深情去感染启蒙的儿童，用优美的意象去陶冶儿童。

以爱国、客观反映史实和民生疾苦著称的杜甫，被选取的诗，多是《月夜》、《赠卫八处士》、《奉济驿别严公四韵》、《别房太尉墓》等表现亲情、友情的诗篇，“三吏”、“三别”等广泛反应社会史实的诗却不选；同样的，在选取以新乐府诗著称、以反映现实为己任的元稹、白居易的诗时，只选取了表现深情、凄婉感人的《长恨歌》、《琵琶行》、《遣悲怀三首》等；《唐诗三百首》收李商隐七律十首，《无题》占了六首，李氏的《无题》诗用事精远、晦涩难解，其间所传达出的缠绵排侧、深挚感人的朦胧情感才是动人的关键；而李贺诗多奇字异辞，内容荒诞诡谲，并不适合启蒙儿童。

总体来说，在所收录的三百一十首诗歌中，有三十二首赠别诗，这些赠别诗，除《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使西征》极个别诗篇出于政治的考量，余者皆是心中情、眼前景，真挚感人；十八首表现亲情的诗，骨肉分离、遥寄相思，如泣如诉，催人泪下；直接思乡的诗三十一首，宦居他乡、出游塞外、隐居山林、委职幕府、漫游天下，长年累月漂泊于异地他乡，其思其情，自然更加刻骨铭心。正是这些“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的亲情、友情、男女夫妇之情等平凡普遍的情感，对于没有什么诗学基础的人来说，理解和接受会更为简单和直接，以大多数人为对象的选诗标准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而非单从一己之性情、兴趣出发来选诗，很容易地被读者、尤其是作为中下层的普通读者所接受，这也是《唐诗三百首》流传不废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兼容并包与精品意识

孙洙从实际出发,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唐诗的风貌。历代的唐诗选本,往往因为宗派或偏好,缺少全面的观点,作为童蒙读本的《唐诗三百首》打破了这种惯例,不偏执于一种诗歌风格,不局限于某种诗学理论,态度公允,照顾全面,适应了各种读者的不同趣味,同时又具有精品意识,选录了重点诗人的代表作品。

全面反映了唐诗的整体风貌,作者的涵盖面广。《唐诗三百首》收录的77位诗人,遍及唐代的各个时期:初唐诗人6人,选诗7首;盛唐诗人27人,选诗186首;中唐诗人24人,选诗66首;晚唐诗人17人,选诗51首。另外三名诗人没有明确的考证资料,他们是《哥舒歌》的作者西鄙人,《杂诗》的作者无名氏,以及《春怨》的作者金昌绪。从作者的社会身份而言,上至皇帝、宰执,下到僧人、歌女乃至无名氏,孙洙选录都一视同仁,反映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社会生活。从中也不难看出,孙洙继承了崇尚盛唐的诗学观点,收录的盛唐诗,占到了整个选本的一半还多,但孙洙同时也看到了唐代其他时期的优秀诗作,中唐和晚唐,所选诗人人数和盛唐相比,几乎毫不逊色。可以说,孙洙是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将唐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试图全面的反映整个唐代的诗坛风貌。尤其是对晚唐诗人的选取与重视,已经完全突破了诗必盛唐的桎梏。在众多的晚唐诗人中,李商隐的诗选取了18首,杜牧的诗选取9首,其诗歌史上的地位,得到充分的肯定。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孙洙大胆的选取了一些流传诗作很少,几乎被人遗忘的诗人,如金昌绪、西鄙人等,孙洙能够敏锐的将二人收录自己的选集中,显示了其兼收并蓄的远见。

除了尽可能多的选取诗人,选编者孙洙还通过各种风格诗歌的选取,来展现诗人的不同艺术风格和艺术追求。这方面,李白的诗表现的最为典型。怀才不遇、生不逢时,是李白诗歌的常调,有人生坎坷的慨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有仕途失意的苦闷,“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夜泊牛渚怀古》),但诗人的笔下,也有旖旎的风光,“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下钟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也有两小无猜的爱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长干行》)……孙洙所选的这些诗,几乎囊括了李白诗的各个方面。再将这29首诗进行体裁上的分类,五言古诗3首,七言古诗4首,五言律诗5首,七言律诗1首,五言绝句2首,七言绝句2首,乐府诗12首,分布于所有各个诗体,显示了李白多面手的特色。

在题材选取上,比较普遍性的题材,无论山水田园、咏史怀古、登山临水,还是赠别怀远、边塞出征、思妇宫怨等等,凡此种种的经典诗歌,大多都被选入。唐代发达的音乐,绘画以及舞蹈文化,是唐诗中的新内容。孙洙就选入了李颀《琴歌》、《听董大弹胡茄兼寄语弄房给事》和《听安万善吹觱篥歌》三首音乐诗,杜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和《丹青引》两首咏画诗以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首咏舞蹈诗。

同时,孙洙选录了唐诗繁荣时期重点诗人代表作品,真正选取了那些脍炙人口诗歌中的“尤要者”。孙洙选录有唐三百年诗作,突出盛唐和晚唐两个时期。盛唐时期突出了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和韦应物,晚唐时期突出杜牧和李商隐,抓住了重点诗人的代表诗作。仅这7位诗人的作品就选录159首之多,占到全书的二分之一。在这些具有代表性诗人当中,孙洙选取他们的作品时,并没有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抓住他们所擅长的诗歌体裁,优中选优,选取他们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也即孙洙所谓的脍炙人口中的“尤要者”。选取杜甫最擅长的律诗23首,选取李白古体诗和乐府诗合计21首,选录李商隐律诗15首,如此重点突出,使全书的作品成为最优的选择。白居易的诗入选6首,数量不多,但因选入了《长恨歌》、《琵琶行》两篇脍炙人口的诗,使得白居易在书中占据特殊的位置。

选录兼容并包,作者面广,风格多样,题材众多,从而也就多方面的反映了那个时代复

杂的社会生活。

（三）实用性

童蒙读物《唐诗三百首》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不仅表现在该选本的编排体例上，孙洙的批语也有挑明题旨、解析章法、指点后学的启蒙作用。

诗歌的编排方式多样，其中主要有两种，一种按作者时代先后编排，一种按体裁编排。不同的编排方式各有侧重，按时代先后编排，往往重在揭示诗歌史的线索；而分体编排则重在辨体。一些大型的唐诗选本，如《唐诗品汇》、《唐诗别裁集》等都是作为写诗范本而存在的，而诗分体、词分调比一般以时代顺序按人编排更便于学写诗词者直接仿效，因此这些选本都采用的是分体编排。《唐诗三百首》就体例而言，它因袭了分体编排的形式，兼顾吟诵欣赏和创作两个方面的优良传统。此书按不同诗体编排，计五古 33 首、乐府 7 首；七古 28 首、乐府 14 首；五律 80 首；七律 50 首，乐府 1 首；五绝 29 首，乐府 8 首；七绝 51 首，乐府 9 首，共 310 首（此书原本可能是 302 首，因屡次刻印，每有增补，故有 321, 317, 313 首等不同）。一方面，这一传统编例能使全书眉目清楚，条理井然；另一方面，唐人完成了从古体诗到近体诗的转变，因而诗体大备，孙洙采纳传统体例，实际上也为初学者展示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全部体裁，虽然孙洙考虑到童蒙书要求明白易解、便于记诵而不选排律，但已大致能概括唐代各体诗的全貌。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五律数目居各体之冠，几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一方面是五律在唐诗中重要地位的反映，同时也恰恰能为初学诗者服务。“清人施补华在《岷傭说诗》中曾说‘学诗需从五律起，进之可为七古，充之可为七律，截之可为五绝，充而截之可为七绝’。”^[4]施氏是同治间人，时代后于孙洙，但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从创作的角度来说，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清人往往把五律看作初学诗者的一种基本功，因为五言比七言少了两字，这就要求作者必须更加在“锻炼”上苦思量，同时，五律又比五绝多了两联，因而也就多了一项讲究对仗的功夫。

诗体选择安排后，就是对具体入选诗歌的精选，孙洙对每首诗歌所做的批语虽然不多，但从其批点题旨、结构、艺术分析、作法中，可见其编录的诗学宗尚。

孙洙解题的批语，包含对诗题的解释和深入分析，也包含对诗歌主要内容的解析。李颀《琴歌》中，孙洙将“月照城头乌半飞”批为“月明”，“霜凄万木风入衣”批为“风冷”；“铜炉华烛烛增辉”批为“火以暖之”；“初弹《渌水》后《楚妃》”，批“皆曲名”；“四座无言星欲稀”批为“一句写旁听者”，“月明”、“风冷”并“以火暖之”，主要烘托周围的环境，听琴歌必然有曲目，介绍曲目，之后就是听众了，可惜旁听者这边正是“四座无言星欲稀”。围绕诗歌题目，讲了诗歌的主要内容，逐步渲染，将人带入琴歌的意境中；李白《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批为“此句一篇之主”于之前一诗批点意旨相同，也在点明主旨；孟浩然《早寒有怀》“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批为“天寒”；“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批为“有怀”，直接对应诗题，纯为解题。

多数诗歌的批语从篇章结构入手。如杜甫的《春宿左省》：花隐掖垣暮，啾啾棲鸟过。（批：日暮起。）星临万户动，（批：星出。）月傍九霄多。（批：月上。）不寝听金鑰，（批：中夜。）因风想玉珂。（批：将晓。）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将其结构层次细细剖分出来。再如骆宾王《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批：在狱。）不堪玄鬓影（批：承首句。）来对白头吟。（批：承次句。）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批：自喻。）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有些批语重在分析诗歌的艺术特点。杜牧的《秋夕》批语云：“层层布景，是一幅着色人物画，只‘坐看’二字，逗出情思，便通身灵动。”点出诗歌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的特色。

孟浩然《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的批语：“二十字可作十五六曾，而一气贯注，无斧凿痕迹。”提醒读者要注意诗歌的整体性和连贯性。

按照孙洙原序中选诗宗旨的分析，“童蒙教育、指点后学”是其选编《唐诗三百首》的宗旨，所以诗歌作法的指点也是其批语的一大特色。丘为《寻西山隐者不遇》，孙洙批语：“直上三十里”为“寻”，“窥室惟案几”为“不遇”；“若非巾柴车”为“陆路”；“应是钓秋水”为“水路”；“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批为“上山起，下山结”有解题，“寻隐者”，一路寻的路线水路和陆路，终结为“上山起，下山结”，这样的诗歌写法可以按照诗题，以空间为序，按照寻的路线，陆路，水路上山，待兴尽后下山，诗歌作结，整个寻访的过程就在诗句中清晰表达，内容充实，讲解了诗歌的具体作法，可为教导的典范。

杜甫《月夜忆舍弟》“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未具体指出批语某句，指出“录少陵诗，止就其纲常伦纪间至性至情流露之语，可以感发而兴起者，使学者得其性情之正，庶几养正之义云。”通过一句批语点出对入选杜甫诗歌的整体用意的透露，从孙洙的身世了解和选本诗歌宗尚也明白了其诗歌美学宗旨，用意很明显：使学诗者得其性情之正，庶几养正之义云，也深化了我们对孙洙选诗宗旨的进一步理解。整部《唐诗三百首》，作为清代至今几百年来影响较大的一部普及选本，我们仅能从原编作者序中了解其选诗的宗旨和用意，此诗批语是诗人最直接的一个注释。

像上面这样着眼于诗歌创作的批语在书中比比皆是，解题，挑明题旨又交代诗歌主要内容，引导学诗写诗的第一步，继而解析结构、进行艺术分析，指点后学学诗，提高欣赏境界，是完成对诗歌整体把握的教导。

三、《唐诗三百首》在清以来的传播

清代唐诗选本种类繁多，具有不同的层次，除诗论家的唐诗选本外，还出现了大量普及性的唐诗选本。按选本的读者对象，这类普及性选本又可分成为应试学子服务的唐试帖诗选本，和以童蒙为教授对象的蒙学唐诗选本。《唐诗三百首》作为清代童蒙唐诗选本的代表，普及面最广，影响最大，它的刊印和传播受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清代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同时也映射出清人对唐诗的接受史观。

（一）科考改革的需求

《唐诗三百首》成书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由孙洙和他的续娶夫人徐玉兰共同编选，署名蘅塘退士。从现存的相关著录和版本资料来看，在乾隆和嘉庆的59年间，并没有该书的翻刻记录，且最早的评注本是出现在道光十四年(1834)的章燮的《唐诗三百首注疏》，可见，《唐诗三百首》在成书后的半个世纪里，并没得到世人关注、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唐诗三百首》在传播初期的这种境遇，与当时唐诗的接受情况和普及程度有重要关系。

从清代唐诗选本编选、刊印时间上的分布，可以看出清代不同时期对唐诗的重视情况。在清代近150种唐诗选本中，100余种可以基本上确定成书年代：^[5]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统
4	39	3	41	5	7	1	4	9	不详

从上表反映情况来看，唐诗选本的编选主要分布在清代前半期，尤其集中在康熙和乾隆两朝，其中除了少量的普及性选本外，其余大部分都是体现诗论家诗学思想的专门选本。这些专门选本的大量出现，主要是清统治者稽古右文政策的倡导，和诗学自身积累发展的结果。

清初，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力行稽古右文、崇儒重道的政策，他们诏令、甚至亲自组织、主持各种图书文献的整理撰修。以此来渲染清代的清明盛世、平和文人的情思，清真雅正的唐诗就成为他们最佳的选择，因此唐诗总集、别集都得到了大规模的整理。如康熙帝既命编一代总集《全唐诗》，又择其精华撰为《御选唐诗》，还为《全唐诗录》亲制序文，其他像雍正、乾隆、道光等帝也都有各自的御选唐诗之著。各种御选、御定、御制序文的唐诗选的颁行，大大激励了文人编辑唐诗的热情。

唐诗选自唐至清，经历多个朝代的发展，积累了充实的唐诗学蕴涵，各种体例、形式也非常完善，清代唐诗选本自然成为集大成者。作为对明代诗学的批判与反思，清初诗坛流派纷立，论争不体，唐宋之争、初盛中晚之争一直存在；在诗学主张上，则神韵、格调、肌理、性灵，各为一说。各论家往往以唐诗选本的形式来标举自己的诗学主张，唐诗选本成为一种直接的诗学形式，因此数量多、题材广、角度多样、体例万端，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体现诗论家诗学思想的唐诗选本数目众多，反映了清代前半期诗学理论的发达和开放，但是编选者和参与者主要是台阁大臣和上层文人，中下层文人和童蒙并没有普遍地学习研究唐诗的热情，唐诗的接受和普及程度是很低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诗赋已非科举之目，而成为无用的东西，在社会上受到极大的冷落。在这种以唐诗为废业的时风下，作为童蒙选本的《唐诗三百首》，虽然成书于诗学昌盛的乾隆朝，却被长期冷落也就不难理解了。

唐诗在清代的普及，主要受科举制度改革的刺激。乾隆二十二年正月清高宗上谕：“会试二场，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韵唐律一首。”^[6]正式确定了清代科举考诗的制度，后乾隆四十七年又于童试加五言六韵律诗一首，对应试者作诗的要求层次降至童试，促使应试教育从童蒙就要重视作诗。朝廷以诗取士的政策，促使了欲以科举为路的读书人注重对诗歌，尤其是对唐诗的学习，此举对唐诗的普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清代中后期，许多文人——无论是台阁大臣还是中下层文士，都将作诗作为一种锻炼和显示自己能力的方式。诗歌的创作也不再限于教授子弟或科场应试，而逐渐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文学样式。现存大量清人创作的诗歌作品和诗集，显示了诗歌创作的普遍性。

（二）诗坛风气的促进

《唐诗三百首》在清代后期，多种注疏、续编、补注本流行于世，翻刻次数多，流传时间长，无他本能及。《唐诗三百首》在刊行上能够出现如此盛况，科举考试的改革所带来的唐诗的普及是其基础，同时还存在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

从现有资料记载来看，《唐诗三百首》在道光年间翻刻了13次，咸丰年间翻刻了5次，同治年间翻刻了5次，光绪年间翻刻了34次。各阶段翻刻次数的多寡，除与各年号的历时长短有关，还受到当时文坛风气的影响。《唐诗三百首》能在光绪年间如此风行，是因为当时诗坛正是“同光体”诗流行之时，这与下层文人对唐诗的广泛接受形成对比。由于同光体诗派所主张的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重人品和学问等诗歌理论，都与下层文人和私塾学生学诗的现实条件差距很大，因此不容易被接受。而《唐诗三百首》所选诗歌明白易晓，而且能体现出主兴象和词意悠长的唐诗特征，这些对于没有文化底蕴而长于形象思维的蒙童来讲是非常适合的。

《唐诗三百首》在清末的流传不衰还与另一本唐诗选本——《古唐诗合解》有着密切的关系，清罗汝怀《唐诗六百编序》中云：“唐诗本之能行于今者，唯《合解》及《三百首》二书”。^[7]《古唐诗合解》是清代另一本流传甚广的唐诗童蒙选本，该书版本繁多，共16卷，分唐诗12卷，古诗4卷，选诗625首（其中唐诗413首），诗人132位，数量相对于其它选本要小。就下层文人和初学者而言，这样的数目更易于他们对唐诗的整体把握

和学习。从所选诗歌篇目看,虽然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盛唐诗人的作品在二书中都占了较大的比重,但比较之下,《古唐诗合解》初盛中晚都有选择,而《唐诗三百首》则稍侧重晚唐诗歌。因此,《古唐诗合解》收有岑参、高适、钱起等人,而《唐诗三百首》更倾向李商隐、杜牧等晚唐诗人。二书相同的篇目仅 60 首,如《唐诗三百首》所不选的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杜甫的《三吏》、《三别》及《秋兴八首》,以及一些初唐、中唐诗人的作品,在《古唐诗合解》中均入选;而《唐诗三百首》中有的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等名作,《古唐诗合解》则未收。由于唐诗中优秀诗作非常多,三、四百首的数量很难说能将这些优秀作品全部网罗,但《古唐诗合解》和《唐诗三百首》所选诗歌的相互补充,有效地弥补了这种缺陷。正是这种互补性,使两书以相对较少的篇目大体涵盖了唐诗名篇,人们通过这两本书就能读到喜爱的诗作,因此二书并行不衰。

(三) 经济发展的推动

晚清以来,地方经济不断发展,带动了士绅阶层的壮大,有力地推进了地方教育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地方教育在书院以下,未设官办学校,童蒙阶段的教育主要由私塾来承担,而私塾又基本上靠士绅筹资兴办。士绅与教育感情甚笃、纠葛颇深。由于封建教育是其获得功名的正途,而家乡是养育他们的地方,即使在外为官,仍带有浓厚的乡土情节,所以士绅热心的帮助家乡的教育事业。他们往往广拓门路、筹措资金,创办了大量的私塾,甚至直接指导和执教学生,勉励子弟勤奋读书,希望他们亦能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地方经济的发展、士绅阶层的壮大,促进了地方私塾规模、数量的增加,客观上增大了对《唐诗三百首》的需求量。而且《唐诗三百首》在其注疏、补注过程中,有多位士绅参与其中,如章燮、陈婉俊,他们或是不求荣达的隐逸之士,或是官员的妻室,都“为家塾子弟起见”,不断完善《唐诗三百首》的注解,使其更加适合初学者研读;清著名学者姚莹还为其孙媳陈婉俊的《唐诗三百首补注》作序,殷切盼望该书付梓。这都有效地推动了《唐诗三百首》在地方上的普及。

1905 年 9 月 2 日,清政府发布谕令,终止了自隋朝以来实施了 1300 多年的科举制,切断了士人传统的晋升之路,开始大量兴办新式学堂,发展实业教育。《唐诗三百首》自此至清朝灭亡的近十年间,基本没有翻刻。但它的传播路程并未就此结束,清末至今的近百年间,海内外出版的各类标点白文、笺释、注疏或语体翻译达 100 多种,这些不同的选本反映着所出现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民国出现了白话本,体现了新旧文化交替的特点;建国初期的选本体现了特殊历史时期政治对文艺作品的影响,大陆和台湾不同的发展点;改革开放后的选本则表现出了多元化发展趋势。”^[8]

清亡以后,《唐诗三百首》已经由人们仕进的阶梯转变成了人们欣赏唐诗的门径,其受众不仅有中国古代的万千学子,在现代社会也有无数的人学习,被这些作品中充满生活气息而并不艰涩难懂的文辞所感染,主动去吟唱。所以其在社会上传播甚广,妇孺皆知,受众跨越阶层,《唐诗三百首》的经典大家地位已不可动摇。

参考文献

[1] 金性尧. 金性尧全集: 7 卷[M]. 上海: 上海百家出版社, 2009

[2] 蕲塘退士. 唐诗三百首注疏. 章燮, 注疏[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

- [3] 童庆炳、陶东风编. 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 [4] 陈婉俊. 唐诗三百首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5] 韩胜. 清代唐诗选本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6]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 卷六十六, 《四库全书》本
- [7] 罗汝怀. 唐诗六百首编序, 同治十三年刊本
- [8] 张素丽. 唐诗三百首选本发展历程述评[J]. 吕梁教育学院学报, 2018(6).

Forever *Three Hundred Tang Poems*

Meng Weng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nthology of *Three Hundred Tang Poems* produced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serves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Firstly,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and his work of *Three Hundred Tang Poems* are introduced, followed by the analysis of its editing features, and then the focus is laid on analyzing the spread of his book in Qing Dynasty to explore the Qing people' s acceptance of the Tang Dynasty poetry. Meanwhile, the version since the Qing Dynasty are introduced. In summary, the classicization process of *Three Hundred Tang Poems* is expected to be sorted out.

Keywords: *Three Hundred Tang Poems*; editing features; spread; classicalization